

朱晓鹏 赵玉强 著

CIVILIAN PHILOSOPHY

平民哲学 与社会发展

南宋浙学精神
及其现代价值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SPIRIT OF ZHEJIANG THOUGHT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AND ITS MODERN VALU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朱晓鹏 教授，1963年生，浙江缙云县人，现居杭州。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硕士，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哲学博士。曾任杭州师范学院政治经济学院院长、中国哲学省市级重点学科负责人等。现为杭州师范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浙江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兼任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浙江省哲学学会副会长等。近年主要从事宋明哲学、浙学等研究，主要学术专著有《智者的沉思——老子思想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道家哲学精神及其价值境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走向发展之路》（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王阳明与道家道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老子哲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9）、《传统思想的现代维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儒道融合视域中的阳明心学建构》（商务印书馆，2019）等多部，在《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等中外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一百多篇。

赵玉强 博士，1981年生，山东临沂人。浙江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哲学、休闲学，主要著作有《〈慈湖诗传〉：心学阐释的诗经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优游之道：宋代士大夫休闲文化及其意蕴》（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向道而生：传统生态文化与休闲思想》（合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成果（项目编号：11JCWH09YB）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成果（项目编号：13YJA720028）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社科振兴计划资助出版项目（项目编号：201808）

朱晓鹏
赵玉强
著

平民哲学 与社会发展

南宋浙学精神
及其现代价值

CIVILIAN PHILOSOPH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SPIRIT OF ZHEJIANG THOUGHT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AND ITS MODERN VALUE

序言 论从传统文化到现代文化的 创造性转化

从当代的视野来看，中国文化发展的现代化，首先是一个从传统文化到现代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过程，但实际上它就是一个“中西古今”的融合贯通过程。也就是说，它既必须打通“中西”，又必须对接“古今”，并最终实现从传统文化到现代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现代思想文化的创新。具体来说，要通过这种“中西古今”的融合贯通实现从传统文化到现代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就至少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和努力：一是必须对中国历史上的基本原典以及重要思想文化现象作深入的解读研究。二是努力挖掘传统思想文化的价值及其意义。三是实现历史追溯与思想探索的紧密结合，即“史”与“思”的统一。四是要致力于探讨传统思想文化的多方面、多层次的重要的现代价值和现代意义。只有这样，在当今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中，民族复兴和中国文化的重建才既可以有其具有普适性的现代性坐标，也可以找到自己独特的民族性基础。



一般而言，所谓“传统”的最明显、最基本的含义就是指那些世代相传的东西。^①而传统文化作为在过去一个较长时期内形成的比较稳定而又世

^① 参见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12页。

代相传、延续至今的观念、习俗及各种相关的精神产品，它往往与过去的历史、已有的权威和固定化的模式相关，因之也就易于呈现为神圣的、保守的甚至落后的形象。尤其是随着现代的“进步”观念的普及，人们较多习惯于把“传统”与“现代”相对立，把“传统”视为“现代化”的障碍，因而需要予以否定。“对于进步主义观点来说，传统包含着阻止发展、阻止把科学和理性运用于人类事务中去的全部因素”。^①与这种激进主张不同的是，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无论是哪种类型的现代化，关键都在于传统性和现代性的互动”。正是“由于传统性和现代性之间缺乏足够的兼容能力，欠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出现中断”。^②因此，在一个国家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并不存在要不要传统文化的问题，而是如何构建起连接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融合通道，实现传统性和现代性的兼容、互动问题。

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有着数千年延绵不绝的文明史的国度。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为我们留下了丰富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面对这种传统的思想文化，正在进行现代化探索的当代人当然有责任也有必要予以继承和发扬，把它们引入现代社会。但是，这实际上需要我们认真思考这样两个重要问题或者说它实际上可以具体化为这样两个重要问题：一是我们究竟要继承哪些传统的思想文化？二是应该如何继承这些传统思想文化？

就第一个问题来说，任何社会的传统都不可能是单一的，而是必然包含了多样性的内容。如在中国先秦就有儒、道、法、墨各家；在南宋思想界就并存着理学、心学、浙学等多种思想传统，还有民间的信仰、习俗等文化传统。那么，我们今天到底应该继承哪些传统文化呢？显然我们今天对传统思想文化的研究、继承和发扬，并不是要简单地向所有传统回归、让所有传统复活，而归根结底是为了有益于现代人的生存和思考，是为现时代以及未来人们寻求一种更合理、更有意义的生活服务的。因此，对传统思想文化的继承要侧重传统思想文化中那些具有恒久生命力和普遍性价值的成分以及那些

① 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第7页。

② 西里尔·E. 布莱克：《比较现代化》，杨豫、陈祖洲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第20、23页。

可以回应现时代问题及重建当代思想文化的丰富可贵的精神资源，使之成为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性转换过程中应予以借鉴依凭的一个特有的民族性基础。只有这样，在当今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中，民族复兴和中国文化的重建才既可以有其现代性坐标，也可以找到自己独特的民族性基础。

就第二个问题来说，应该如何继承上述这些传统思想文化？这实际上涉及传统思想文化现代化或作用于现代社会的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的具体途径、方法问题。我认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互动的最主要路径就是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由华人学者林毓生教授最早提出的“创造转化”的观念，近30多年来已经在国内及海外华人的文化圈、学术界被普遍接受。创造性转化意味着从现代的维度来观察、研究传统思想文化问题。它不但要以此克服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西化派与传统派的长期对立与纠葛，也要求超越可能缺乏自信的“中国传统思想如何现代化”的命题，将一百多年来学者们有关思想变革的看法，导入至少在心态上是一种相当健全的方向。正如韦政通先生所说的，“创造转化”思想的精髓，不但对中国的思想传统在态度上应批判地继承，对西方文化也应做到批判性吸收，彻底消除以往“我族中心”或“西方中心”文化交流上的不平衡、不理性的状态。^①

按照这一思路，从传统文化到现代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就不仅仅涉及“古今”问题，还涉及“中西”问题。正因此，有关中西古今之争成了中国近现代一个最重要的文化主题。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化思潮与文化论争，大多是围绕古今中西关系而展开的，从中体西用论、西化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化热，这一主题都不断再现。这种中西古今之争的实质是如何理顺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从而解决任何后发展中国家在迈向现代化过程中都必然碰到的现代文化的重建问题。

不过，从历史形态看，这样一个复杂的“中西古今”问题，首先碰到的就是严酷的“中西”冲突问题。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中国人在面对遭

① 参见韦政通《中国思想传统的创造转化》，《韦政通自选集》自序，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第1页。

受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侵略和先进科学技术及文化的强烈冲击后所产生的严重的文化危机时，首先提出了“中体西用”论，即以西方先进的科技之用补救中国固有文化之体，试图以此作为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创造性转化的主要应对之策。但是这种“中体西用”模式是注定行不通的。因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小农为主导的农业社会，近现代社会在本质上是以大工业生产为主导的工业化社会和以商业生产和交换为主导的市场化社会。显然，这两种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和文化形态是存在巨大差异的。这种差异不仅仅是空间分布上的不同类型，更体现了时间纵向上的不同发展序列。中国传统社会文化是典型的古代社会文化形态，而西方近现代社会文化则是现代性社会文化形态，他们之间有着质的区别，中西异质文化和异质社会造成的这种“中西之别”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古今之别”。所以，如果说“中体西用”论还基本上把中西方文化定位为不同的文化类型，甚至骨子里还把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看作高于西方文化之“体”，那么，自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失败证明了“中体西用”论完全破产后，随之兴起的西化论、新文化运动等则已将“中西之争”进一步演变成了“古今之争”，即将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看作停留于中古阶段的社会文化，而西方近代以来的文化则被视为代表着人类新的文明方向的现代文化。^①因此，中国近现代“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也就并不仅仅是被当作不同文化之间模式、典范的“转型”，更被视为社会文化在整体层面上由传统向现代的演进、变迁。正如冯友兰所说：“一般人心目中所有之中西之分，大部分都是古今之异。所以以近代文化或现代文化指一般人所谓西洋文化是通得多……我们近百年来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的，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的，这一个觉悟是很大的。”^②

从文化发生学来看，上述观念演变是有其合理性的。中国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冲突实质上是在不同历史阶梯上的文化冲突：近代中国还是传统文化的世界，但它面对的已不是西方世界的传统文化，而是近现代文化！这样一种以传统文化对抗现代文化的战争，当然是难免失败的。所以我们不能简单

① 参见朱晓鹏《从“中西之争”到“古今之争”——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近现代变革》，《河北学刊》2006年第2期。

② 冯友兰：《冯友兰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第156页。

地对中西文化作出好坏优劣甚至先进落后的价值判断。就一般而言，任何一种文化的价值及其效用都不可能是无限的，而是必有其核心与边界。根据经济学上的“边际效用”原理，一种东西的价值及其效用将会呈现从核心到边界的递减规律。因此，要对各种文化的价值及其效用进行正确的判断，必须首先对不同文化划分出其合理的“价值边界”，从而认识到不同文化既有其核心价值，也有其“价值边界”。在这种“价值边界”，其文化的价值及其效用很可能十分微小甚至归零。根据这一道理，我们要对中西文化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也必须首先对中西方不同文化划分出合理的“价值边界”。就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尽管在其“价值边界”以内，有其曾经十分辉煌、灿烂的核心价值，但是一旦超出了其“价值边界”，其效用可能就不行了，因为它已经与其相适应的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历史条件相脱节，所以无法发挥其应有的效用。如传统伦理道德主要滋生并适应于以血缘宗族关系为基础的乡土社会、“熟人社会”，但显然已经不适用于现代高度流动性、平等化的工商社会、“陌生人社会”。这样来看，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传统文化失效了，因为实际上是它已超出其适应范围。而面对现代高度流动性、平等化的工商社会、“陌生人社会”，必须进行与之相适应的伦理道德的重建。

二

如上所述，从当代的视野来看，中国文化发展的现代化，首先是一个从传统文化到现代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过程，实际上它就是一个“中西古今”的融合贯通过程。也就是说，它既必须在空间维度上打通“中西”，又必须在时间维度上对接“古今”，并最终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创造性转化和现代思想文化的创新。

一方面，必须打通“中西”。要求打通“中西”并不意味着现代化是简单的“西方化”。因为实际上任何文化形态的更新发展都离不开以原有文化主体的积累作为有效载体，也离不开原有文化主体的积极参与作为内在动力。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能够延续发展几千年的顽强生命力也使它完全具备作为文化更新发展的有效载体和内在动力的主体资格。历史事实表明，一种

具有丰富独特的民族性、地域性色彩的文化越是具有活力，在世界文化舞台上就越能够散发出独有的魅力，从而越容易具有世界性的地位和影响。因为所谓世界历史和世界文化也就是由这种丰富的富有活力的多样性文化组成的。所以，无论是“中体西用论”还是“西化论”，都无法最终有效地解决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现代化问题。这样要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创造性转化，对中国固有的丰富悠久、深刻博大的思想文化传统首先应该有深入准确的了解，这几乎是不待言的。但是仅仅如此显然还不够。要知道我们已经生活在东西方文化广泛交融甚至文化全球化的时代，不论承认与否，我们都已经受到西方文化的深刻影响。西方文化在从传统到现代的文化形态的更新发展上先走了一步，因此具有示范作用，可以说西方文化已经作为一个重要的参照系存在于我们的面前，这是我们所无法回避和漠视的事实。更何况，一百多年来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冲击，以致造成了中国原有的传统社会秩序和文化体系崩溃的严重社会文化危机。因此，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及其关系就成了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整个近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论争首先是围绕着这种“中西之争”展开的。作为造成了中国近代社会文化空前严重危机的外来异质文化，正可以对中国思想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创造性转化形成必要的张力。

思想文化的转型一般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主动的自我更新，如明清之际的思想启蒙运动、西方的现代化运动；一种是被动的诱致性变迁，如近代中国文化的变革。不过，在现代社会文化条件下，特别是全球化进程加速推进的世界里，上述两种模式几乎都不可能单独发生和成功。真正成功有效的思想文化的现代转型，往往都需要两种模式的交互作用，最后形成由被动的诱致性变迁导致的主动自我更新，从而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创造性转化。因此，我们实际上要对西方文化有很深的了解和吸收，使西方异质文化和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相互融合，才可以做重建传统的创造性工作。而且西方文化作为一种异质文化，能使人对自己原有的文化圈产生“距离”，从而有利于对其进行更清醒、理智的审视和批判。可以说通过吸收异质的西方文化而达到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是现代思想文化创造的一个重要途径。总之，现代思想文化的真正发展，绝不是在原有封闭的文化体系中的自我爬行，而必须放眼

世界，以全球化的眼光、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来对待一切外来文化和先进文化，以人之长，补己之短，勇敢地融入浩浩荡荡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去，创造出中西文化会通融合的现代新文化。这既是文化变革的内在要求，也是文化发展和创新的必要条件。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康有为、严复、谭嗣同、孙中山等都主张中西文化不同程度的会通融合。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提出：“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① 严复则指出：“必将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② 孙中山也强调：“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③

另一方面，必须对接“古今”。如前所述，古与今、传统与现代并不是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想文化的转型不是要通过彻底否定传统、抛弃传统来实现的。因为社会及文化的发展有一些共通性，现代社会文化的发展也需要植根于传统的活力，需要从传统中吸取有用的资源；现代文化的发展还可以从传统文化的形成、发展的机制和理路上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所以任何文化形态的更新发展都不可能是在一个文化“废墟”或“空地”上出现，更不可能直接通过文化移植或文化替代来实现，而是必然要在原有的文化基础上进行文化重构。但是，中国传统文化毕竟又是适合于传统社会这一特定时代的精神产品，它更多地具有过去的历史时代的特征，反映着以往社会文化的需要，体现了一种历史性的维度。在某些时候，传统本身的丰富性恰恰有可能成为人们大胆地走向未来的沉重包袱，以至于让“死的拖住活的”。如有些海外学者就指出，晚清政治改革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改革者们没有利用现代民主权利原理彻底否定作为帝国政权合法性基础的天命论，却大力求助于《孟子》或其他儒家早期典籍中蕴含的自由主义因素，所以，“从一种重要意义上来说，可能正是中国政治思想本身的丰富性和完善性——不管它具体实现到何种不完善的程度——构成了它走向现代化的障碍”。^④ 这说明任何社会由“古”到“今”、从传统向现代的变迁都很难说

① 康有为：《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第294页。

② 严复：《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第560页。

③ 孙中山：《中国革命史》，《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1，第60页。

④ 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第62页。

会是直线性的，更不是自然而然地过渡的，而可能充满了反复性和复杂性。因此，思想文化的转型需要建立现代性的维度，从现代人的需要和眼光对传统进行分析和反思，剔除传统中消极的、不合理的成分，使它能赢得现时代更多人的心理认同、文化认同，获得更多更大的文化包容性，体现出思想文化的时代性、世界性。当然，更重要的是，要以思想文化的创新来实现传统思想文化与时展性、现代性的对接。继承的目的是创新，离开了创新，文化变革也就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只有创造出符合现代社会生活特点和需要的新文化，传统思想文化的现代转型才能算是成功的，才可以说是从传统到现代的创造性转化。因此，要弘扬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至少要具备现代的基本能力、基本的知识和思考的训练，要有明确的现代意识。在这个基础上，去消化传统的思想，去思考传统的问题，去审视传统的思路，给传统问题一个属于这个时代的解释，赋予传统以现代的生命，使它具有现代的意义。否则，如果仅仅以传统解释传统，就可能会由于它已经缺乏活泼泼的生命的承载而把传统变成一种僵化腐朽了的东西，甚至是让“死的拖住活的”东西。也只有如此，思想文化才具有真正的现代性。如前所说，如果说“中体西用”论还基本上把中西方文化定位为不同的文化类型，文化形态的更新发展过程被当作不同文化之间模式、典范的“转型”，那么，将“中西之争”进一步演变成“古今之争”之后，中国现代文化形态的更新发展过程也就被视为在社会文化的整体层面上要实现由“古”到“今”、从传统向现代的变迁。实际上，这样一个过程到现在为止仍然远未完成，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化仍然任重而道远。

三

具体来说，要通过“中西古今”的融合贯通实现从传统文化到现代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就至少还要从以下几个具体方面展开和努力。

一是必须对中国历史上的基本原典以及重要思想文化现象做深入的解读研究。以儒家、道家等为代表的传统思想作为中国文化史上辉煌灿烂的思想范本，是真实地体现出了民族文化的原型精神的文化符号，是中国传统文化

中极为重要的基本组成部分，是以后的思想者可以反复从中汲取思想养料、获得思想启迪的重要精神资源。系统深入地研究这些重要思想能够帮助今人更好地理解一个文明的整体性质和特有的文化传统所具有的内在特质，即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文化类型和理论思维的特点，理解其中所蕴含的各种核心价值和基本观念对于本民族悠久的文明发展所起的规范和导向作用。在具体的解读研究中，应该采取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一方面，要对各种经典原著和重要史料包括出土文献做必要的考证、整理和诠释，因为对一些史料史实进行考证和尽可能提供深入确切的分析说明，切入对文本的具体诠释的深度解读研究，正是任何一种思想史的研究都需要的最基础的研究。为此，只有尽可能地“复原”或“再现”那些基本原典以及重要思想文化现象产生时的现实“语境”，重建它们在历史上的思想生态环境，才能够尽可能地与古代思想家进行超时空的交流、沟通和“对话”，从而实现较客观准确的理解和阐释。另一方面，由于任何原著和史料都不可能是一种僵死了的抽象理智的陈列、是一系列毫无生气也毫无联系的史料的堆积，而是一些体现了前人对自然、社会、人生、价值、理想等的理解和追求，以及表达、阐述这些思想、理论和信念的建构方式和概念系统，因而今人对以往思想的研究，除了应努力对那些原创性原典做全面的、富有新意的解读，甚至在微观上对一些重要的概念命题和史料史实做必要考证辨析之外，还应着重从学理上对那些原典及其思想展开多层次多角度的探析。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仅满足于对原著和史料包括出土文献的考证、整理和诠释，更应对古人通过那些具体的文本所体现出的思想和认识做深刻系统的理解和阐释，并且学习研究这些思想和认识生长发展的特有方法和途径即“如何思想”，努力揭示那些基本原典以及重要思想文化的基本内涵、主要精神及其固有价值 and 意义。尽管它们难免还会掺杂有我们今天的阐释者“自己的理解和阐释”，但这种从考据与学理、文本结构与逻辑结构、宏观与微观、内在逻辑与历史发展相统一的多元化角度对传统思想文化的理解、把握，无疑十分有利于从整体“原生态”上、从活生生的思想有机体上来贯穿和统揽整个传统思想的理解和阐释，以此尽可能构建、复原那些真实的传统思想形象。

二是努力挖掘传统思想文化的普适价值及其意义。大凡人类历史上重要

的思想文化体系，都具有时代性和普遍性双重属性，也就是说，它既能够适应当时当地社会环境的需要，又或多或少包含有某种超时空的价值。而思想文化中的这种价值，正是根源于人类面临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的共同性，根源于人类对超越自然、实现人性的共同追求。它往往构成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基础，体现了某些人类生活的共同准则和人类道德价值的底线或理想。中国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其悠久传统所体现的深厚的文化积淀，往往就具有极丰富的价值。特别是其中所蕴含的丰富的人生智慧、生态伦理观念、道德礼仪文化，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贡献给人类社会的最具有价值的文明成果之一。这些丰富的人生智慧、生态伦理观念、道德礼仪文化，在剔除掉其中不合时宜的一些具体历史内涵后，作为观念样式，它们确实仍具有某些超时空的价值，兼有时代性和普遍性的双重属性。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飞跃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巨大提升，对于这些具有普遍价值的传统文化精神，我们不仅要敢于公开承认，更应该大力予以宣示和传播。可以相信，今后它们将会越来越多地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尊重，也会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

当然，注重传统思想文化的普遍价值并不意味着排斥传统思想文化自身往往特有的地域性、民族性、本土性的价值，相反，如前所述，在文化上，往往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从世界文化发展史上来看，正是丰富多样的民族性、地域性文化组成了所谓世界文化。譬如，就中国思想史上的南宋浙学而言，即使是其作为当时一种非主流的、地域性的甚至被边缘化的思想学说，也不见得仅仅具有有限的地区性的意义，其中有可能蕴含了当时主流文化、正统社会还无法理解和包容的新的价值观。因此，研究具有独特的地域性、民族性、本土性价值的南宋浙学等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不但对于研究特定地域的传统思想文化与当时的整个思想文化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以及地域性与全球化、区域文化与普遍性文化等的关系，都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对于探讨那些独特的区域文化传统中所蕴含的根本性“本土性问题”及其解决方案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价值和地位，探讨在目前日益全球化背景下重新评估“地方性知识”的意义和普遍性价值，以及当代问题意识下思想文化的本土化途径、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路径等问题都会富有启迪作用。因此，对多元化的思想文化生态的宽容正是一切思想文化发展的必要空间和根

本保障。

三是实现历史追溯与思想探索的紧密结合，即“史”与“思”的统一。例如哲学的思考不同于其他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离不开对以往哲学史的研究，正如黑格尔所说的，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从一定意义上说，哲学就是“史”与“思”的结合。哲学作为一种“思”，总是在过去“思”的积累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哲学史作为过去“思”的积累，其本身就构成了哲学之思的一个基础，是与我们现在的“思”密切相关的一种“活”的历史。任何新哲学的重建总是以不断地反省以往哲学为自己的前提。因此，哲学史上曾出现过的那些哲学思想，特别是那些具有原创性的重要哲学思想，就成了后人需要不断返回驻足的思想原点，成了以后的思想者可以反复从中汲取思想养料、获得思想启迪的重要精神资源。正因此，我们必须以丰富全面的历史材料、经典文本作为基础进行扎实的研究。但是我们又必须站在现代的前沿，以对现实社会和人生重大问题的关切为基点，从“以道观之”的形而上高度作为视点来推进理论的智慧之思，以史和思的联系来展开其所思的维度，以求在融通古今中西原创的思想智慧基础上以“既济”来支撑“未济”，使任何当下的思想探索都既有充分的历史厚度，又始终能有一种面向未来、保持开放的态度。显然，这样一种态度，在今日中国思想文化长期丧失本位状态的情况下，应该是对于传统思想文化的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批判继承态度，也是一种在“会通以超胜”的开放视域和总体取向中的思想创新之路。

四是要致力于探讨传统思想文化的多方面、多层次的重要的现代价值和现代意义。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意义还在于它能够当代的思想文化的研究和创新提供可以借鉴的宝贵资源。因为传统思想文化并不是一种只能供博物馆展览的“化石”，它仍具有许多“活的精神”，仍具有多方面、多层次的重要的现代价值和现代意义，值得现代人去深入挖掘、阐发和借鉴。所以传统思想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必须以现代意识和批判精神去审视那些传统思想文化，以较广阔的视野、较大的包容性和必要的前瞻性深入地分析其所具有的现代意义及其局限性，努力做到在现代人的视野中分析把握古典思想，以现代批判意识去重新评判传统精神，努力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研究探

讨传统思想文化中含有的现代价值和现代意义。而且，形而上的沉思不能疏离形而下之域，任何理论探讨本来就不能局限于单纯的形而上的沉思，而应该切入现实的形而下的生活世界中去，在其中去关注社会生活的本质、发现现实中的根本性问题，然后利用各种思想文化资源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 and 办法。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思想文化的现代价值正是主要取决于它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利用这种思想文化资源发现现代社会生活的本质、解决那些根本性问题。

总之，将传统思想文化与时代性、现代性有效对接，有利于我们以开放的心态、兼容并包的气度、综合创新的精神，通过中西方多种不同文化、思想的融合会通，为传统思想文化的现代性转换和重建探索出新的境域，也为在实践上构建一种人类社会的新的生活方式和更合理的文明形态而提供自己特有的精神导向作用。为此，我们要以现代性的维度为参照系来评价和探求传统思想文化的现代价值，既要发现其与现代化、现代社会的契合性，并予以现代阐释和对接会通，也要发现其与现代化、现代社会的异质冲突性，并予以梳理过滤、筛选改造等，从而最终努力挖掘和转化传统思想文化中所蕴含的价值及其现代意义。而显然，从传统文化到现代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乃至思想文化的真正创新也就体现在这样一个过程中。

目 录

绪 论	1
一 南宋浙学的研究现状	2
二 南宋浙学研究的现代意义	4
三 南宋浙学研究的方法问题	9
第一章 南宋浙学产生的社会时代背景	13
一 唐宋变革	14
二 经济自由的初曙	18
三 政治的集权化与平民化	30
第二章 浙学及南宋浙学	40
一 “浙学”概念考	40
二 “浙学”新说	45
三 南宋浙学的思想史价值	50
第三章 宋代思想的演变与南宋浙学的形成	57
一 北宋思想文化遗产	58
二 政治实用主义	62
三 道德理想主义	65